

ISSN1000-2677



西華師範大學

學報

ISSN 1000-2677

3
1994

JOURNAL OF
SOUTHWEST
— CHINA
TEACHERS
UNIVERSITY



哲學社會科學版

ISSN1000-2677



西南師範大學

字報

ISSN 1000-2677

3
1994

JOURNAL OF
SOUTHWEST
— CHINA
TEACHERS
UNIVERSITY



哲學社會科學版

编辑出版单位 西南师范大学
哲学社会科学学报编辑部

主编 徐仲林

副主编 陈国贵

刊号 ISSN1000—2677
CN51—1098/C

印刷单位 西南师范大学印刷厂

总发行 重庆市邮局

订购 全国各地邮局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邮政编码 630715

国外发行代号：Q 1181

国内发行代号：78—20

定价：1.60元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明实录类纂·四川史料卷》

李国强 杨昶主编 黎邦正 刘重来 郑家福点校

武汉出版社1993年2月出版

《明实录》是明代官修编年体史料长编，自明太祖至明熹宗15朝共15部，计2925卷，近2000万字，明代制度，新君即位，即修先君实录。实录充分利用诏令奏议、百司案牒等官方档案，以帝王为中心，年经月纬，将一朝的政治、经济、军事、灾异、文化乃至帝王婚丧喜庆等统统记载下来。一部实录，实际上就是一朝的史料总汇，利用价值极高。

多年前，就有专家主张，把《明实录》分门别类、摘录汇编成较完备、系统的专题史料。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所长李国强教授受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委托，主持分类汇编大型丛书《明实录类纂》，《四川史料卷》就是其中的一部。它是从《明实录》中摘出130万字的四川资料，通过点校、补遗、分类、编纂而成。其内容丰富、涉及面广，举凡明代四川的资源、灾异、政治、经济、军事、人物、文教、涉外关系、民族等，无不网罗其中，史料价值极高，是研究明代西南及四川地方史和编写西南地方志不可缺少的参考书。

《明实录类纂·四川史料卷》系四川省“八·五”重点古籍整理项目，此书分类科学、点校精确、出版后受到同行专家好评。目前还有少量存书，每册定价人民币60元，欲购者请通过邮局汇款至：重庆北碚西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研究所夏春芳收，邮编：630715。

(刘重来)

《论语词典》

李运益主编，喻遂生、蒋宗福副主编，李海霞等编著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出版

《论语词典》是国家教委“八·五”全国高校出版社重点图书《先秦诸子专书词典》之一。本书以全书中切分出来的词为单位，每词之下出示总频率及各义项频率；分现代、中古、上古三段注音；释义参伍比较古今各家成说，择善而从。通过频率统计，可以准确把握各语词在原书中的使用情况；通过现代普通话读音便于诵读原书、上古音以便读者了解原书字词音义关系和通假声转条例、中古音以便读者认识上古音与中古音的对应及演变情况。全书频率统计精确，释义详尽可靠。为古代文史哲研究，尤其是汉语词汇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翔实材料。该词典按笔画编排，并附有音节索引和复音词逆序索引，便于检索；后附《论语》原文，以便读者阅读和查检核实。本书是先秦汉语词汇尤其是《论语》词汇的学术参考资料，编排科学、合理，在今年元月召开的中国文化语言学会第三届学术讨论会，以及5月下旬召开的四川省语言学会第八届年会上，受到与会专家、学者一致好评。

该书装帧精美考究，大32开，43万余字，定价12.40元。现有部分存书，欲购者请与西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研究所夏春芳联系，款到即免费挂号邮寄。

(蒋宗福)

西南師範大學學報

(哲学社会科学版)
(季刊)

3

1994

(总 79)

目 录

执行编辑 韩云波
目录翻译 陈春发
1994年7月25日出版

试论邓小平的特区思想	陈 跃 (3)
邓小平的青年观初探	孟东方 (8)
四川少数民族的构成、人口分布特征及形成原因	罗正富 李文碧 (13)
关于义务教育中的教学原则	陈重穆 (16)
学法研究——当代教学观念转变的主题之一	张庆林 杨渝川 (22)
努力实现教学质量的目标管理	牟宗福 (27)
1902—1929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述评	别必亮 (31)
我国古代学校的学生管理	钟 杨 (37)
献陋献曝 求真求实 ——关于中师《教育学》修订本中若干问题的商榷	冉 苒 (42)
先秦史籍概说	赵淡元 (48)
从《通典·食货典》看杜佑富国安民的经济思想	徐大英 (53)
论古代监察制度的廉政功用	龙大轩 (57)
中国外戚史研究 宋代后妃、外戚预政的特点	杨光华 (62)
严复与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	杨义银 (68)
《新华日报》 史研究 《新华日报》与妇女解放	曾小勇 (74)
《新华日报》 史研究 《新华日报》与国统区妇女争取和平 民主的斗争	苟翠屏 (78)
日本战后的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	吴建华 (82)
公元前四世纪前期雅典采银业状况考	徐松岩 (88)
现代诗学 毛泽东诗学管窥	敖 志 (92)
研究 论中国现代新诗的歌谣化运动 ——兼说《国风》、《乐府》的现代意义	李 怡 (97)
卓越的诗才与自觉的选择 ——罗门诗片论	刘扬烈 (103)
从民俗学角度研究鲁迅小说	赵稀方 (108)
战时大后方文学与法西斯国家文学交往片论	苏光文 (112)
英语副词性小品词	陈治安 (117)
论高师英语函授教学	李渝华 (122)
论著作权人与作品使用者的合同关系	周安平 (125)
新书品录 心理学本土化的一个成功的尝试——喜读《大学生心理的发展》 (田守铭, 128) 《明实录类纂·四川史料卷》(刘重来, 封二) 《论语 词典》(蒋宗福, 封二)	
文摘 高校文科学报办刊机制改革试探(韩云波, 41) 高校学报编辑活动 的心理影响因素(曹莉, 52) 激光照排与学报成本控制(张兴莲, 73) 论编辑的非理性因素(吴长开, 77)	
消息 第二届中日教师教育研究国际会议综述(61) 全国“邓小平与中 华腾飞”研讨会简述(102)	

JOURNAL OF SOUTHWE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Quarterly)
No. 3, 1994 (General Number 79); 25 July, 1994

CONTENTS

Deng Xiaoping's Theory on Special Economic Zone Chen Yue(3)
A Preliminary Study on Deng Xiaoping's View about the Youth Meng Dongfang(8)
On the Principles of Teaching in Compulsory Education Chen Zhongmu(16)
A Study on Learning Methodology — One of the Subjects about Changing
the Concepts of Contemporary Teaching Zhang Qinglin & Yang Yuchuan(22)
Objective Control over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Mu Zongfu(27)
Comments on Development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of China from
1902 to 1929 Bie Biliang(31)
Supervising Students in Schools of Ancient China Zhong Yang(37)
A General Survey of the Historical Records before Qin Dynasty Zhao Danyuan(48)
Supervisory System; A Guarantee of Honest Official Performance Long Daxuan(57)
Interference in Political Affairs from the Emperor's Concubines
and Their Relatives in Song Dynasty Yang Guanghua(62)
Yan Fu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ional Character
in Modern China Yang Yiyin(68)
Xinghua Daily and Women's Liberation Zeng Xiaoyong(74)
Xinghua Daily and Women's Struggle for Peace and Democracy
in Guomintang-occupied Area Gou Cuiping(78)
Japan's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and Growth of Economy
after WW I Wu Jianhua(82)
Attic Silver Mining in the First Half of 4th Century B. C. Xu Songyan(88)
On Mao Zedong's Theory of Poetry Ao Zhong(92)
On the Poems of Luo Men Liu Yanglie(103)
The Study on Lu Xun's Novels from the View of Folklore Zhao Xifang(108)
The Contact of Chinese Literature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with That of Fascist Countries Su Guangwen(112)
Adverbial Particles in English Chen Zhi'an(117)
The Contract Relations between the Copyright Owner and
the Works User Zhou Anping(125)

试论邓小平的特区思想

陈 跃

特区思想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是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扩大改革开放,加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本文拟对此进行探讨,以促进对邓小平特区思想的学习和研究。

一、特区思想的提出和发展

邓小平的特区思想包括设立特别行政区的思想和兴办经济特区的思想两部分,这个思想从提出到基本形成有个发展过程。

1、设立特别行政区的思想

中国设立特别行政区的思想,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形成的。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首次阐明了对台湾问题的立场、观点,同年元月30日邓小平在向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解释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时表示: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讲话,进一步表示,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保留军队……,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1982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明确指出,关于收回香港主权问题,可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来解决,也就是在统一的国家内,允许香港(包括台湾、澳门)设立特别行政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而大陆主体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1984年5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确认在香港、台湾、澳门设立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国策。至此,设立特别行政区的思想基本形成。

2、兴办经济特区的思想

1979年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在与广东省委负责人的谈话中,第一次提出了兴办经济特区的思想。他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1]根据这一思想,1979年7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市划出部分地区试办经济特区,最初称为“出口特区”,1980年5月决定改“出口特区”为综合性的经济特区。1981年和1982年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发出三个文件,进一步阐明了办经济特区的各项方针、政策。1984年邓小平在视察深圳、珠海、厦门经济特区时,明确指出:建立经济特区的指导思想不是收,而是放,经济特区起着技术、管理、知识和对外政策的窗口的作用,同时,还提出了开发海南岛的思想。根据这个思想,党中央、国务院于1987年9月决定在海南建省,把海南建成最大的经济特区。1992年,邓小平再次视察深圳、珠海,当他看到深圳、珠海的巨大变化和建设成就时,明确指出:特区姓“社”不姓“资”,并强调在特区的建设上,“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大胆地试,大胆地闯”。^[2]这些谈话既澄清了经济特区发展中的是非争论,又进一步指明了经济特区建设的政策和发展方向,使经济特区思想日臻完善。

二、特区思想提出的依据

1、坚持一切以实际出发和矛盾特殊性的原理

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基本要求。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十分重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重要性。他明确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

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3]在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加速现代化建设，如何有效地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加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行列；同时，怎样才能尽快地而且以最有效的方式实现祖国的统一，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所有这些都是现实提出的新问题，已有的理论和现存的模式都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邓小平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仔细分析研究了商品经济发展所固有的开放性特征以及国际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社会现实，又调查了世界先进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途径，并从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现实情况出发，总结了世界各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经验教训，开创性地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国家内设立经济特区和特别行政区的思想，以扩大改革开放，加强对外交流，促进经济发展，加速国家的早日和平统一。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要突出矛盾的特殊性。为了积极参加国际间的经济科技活动，兴办特区已成为世界各国实行对外开放，扩大对外联系和交流的一项重要措施。因而，加速特区建设已成为各国都十分重视的普遍现象。然而，在这一世界性的普遍现象中，中国的特区建设突出了自己的特殊性。我国的经济特区不是一般性的加工区、贸易区，而是坚持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多功能综合特区，这是由我国社会的性质和经济区的特殊环境所决定的。同时，我国还从香港、台湾、澳门的历史和现实出发，在这些地区设立特别行政区，实行与国家主体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由此可见，我国的特区建设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和矛盾特殊性原理的光辉典范。

2、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

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要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已经取得的经济科技成果，包括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面对国内严重的经济危机指出：要加速苏维埃社会主义经济的发

展，必须“在经济上极力利用，加紧利用和迅速利用资本主义的西方”。^[4]邓小平从马克思主义这个基本观点出发，认真分析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几百年前为了适应他们对外开放的需要，促进与各国的经贸往来，推动本国经济发展，就建立了不同形式的特区，他们的经验可供我们参考和学习。邓小平正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历史和经济技术发展的实际，大胆地提出在我国设立特别行政区和经济特区的思想，使我们能直接通过香港、台湾、澳门这三个通向世界资本主义的桥梁和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岛这五个通向世界的窗口，更好地与世界相联系，更有效地利用资本主义，进而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3、中国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

回顾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唐朝的鼎盛，元大都的兴旺，都是由于广开国门，促进经济技术和文化交流所得。近代中国的落后、贫穷，主要在于统治者的专治统治和闭关锁国政策。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我们在加强对外交流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但因未能处理好独立自主与对外交流的关系，关起门来搞建设，错过了多次经济科技发展的大好机会，拉大了我们同发达国家的经济科技差距。对此，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三十几年的经验是，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5]设立特别行政区和兴办经济特区就是要扩大改革开放，敞开中国的大门，使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加强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和合作。

4、世界和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

由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自十月革命胜利以来，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就并存于世，这种并存在短期内还不可能消失，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在世界统一的大市场中相互贸易，相互交流，相互利用。既然在世界范围内两种社会制度可以长期并存，相互交流和利用，为什么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就不能实行

主体是社会主义制度,而让部分地区(如香港、台湾、澳门)设立特别行政区,保留资本主义制度呢?这对祖国的统一,扩大对外交流和经济的发展,港、澳、台的稳定与繁荣都有利。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发展亦不平衡,香港、澳门还处于英国和葡萄牙的殖民统治下,台湾还处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其政治经济的发展状况同内陆各地的差距巨大。不仅如此,就大陆内部自身来讲,东部沿海省市与内地省市相比,无论在经济文化、交通、通讯方面,都有较大差距,这种国情决定了要尽快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扩大对外交流,不可能在全国各地实行统一的政策,应根据不同的情况制定不同的政策。因此,邓小平和党中央决定在香港、台湾、澳门设立特别行政区,在沿海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岛设立经济特区。

三、特区思想的主要内容

邓小平的特区思想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内容:

1、特别行政区思想的主要内容

(1)特别行政区的性质是资本主义的综合性特区

邓小平在谈到香港、台湾、澳门设立特别行政区时指出: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大陆十亿人口实行社会主义,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如香港、台湾、澳门。因此,在香港、台湾、澳门设立特别行政区,不是要用社会主义吞掉资本主义,而是尊重历史和现实,在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上仍然保留其资本主义,至少五十年不变。特别行政区不是单一的经济或政治特区,而是溶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于一体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综合性特区。

(2)特别行政区的指导思想是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

关于设立特别行政区的问题,邓小平明确指出:这个构想首先是从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出发的。解决台湾、香港问题可以有两种方式,即和平与武力。武力解决总是不好的,怎样才能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呢?这就必

须尊重历史、考虑现实,既要照顾英国和葡萄牙的利益,台湾国民党的利益,又要维护祖国的统一,保持港、台、澳的繁荣与稳定,唯一可行的办法,只能是在统一的国家范围内,允许在港、台、澳设立特别行政区,保留其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

(3)特别行政区实行特殊的政策,享有高度的自治权

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西东大学杨力军教授时指出:“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区所没有而为自己所独有的某些权力”,“在现行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的情况下,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管,中央政府还给台湾留出名额”。^[6]1984年6月22日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时又说:“我们政府在1997年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后,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不变,香港可以继续同其他国家和地区保持和发展经济关系,北京除派军队以外,不向香港特区政府派出干部”。^[7]以上这些特殊政策是特别行政区的独特之处。

(4)特别行政区的地位是统一国家的地方性政府,不拥有国家主权

设立特别行政区以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为前提,特别行政区是统一国家的组成部分,是直辖于中央政府的地方性政府,不拥有国家的主权,不能独立行使整个国家的外交、国防、宣战、媾和等权力。任何破坏国家统一、主权完整,民族独立和尊严的行为,都必须严厉禁止。正如邓小平指出,作为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但条件是不能损害统一国家的利益。

(5)特别行政区的作用是中国与世界经济交流的通道和桥梁

香港、台湾都是国际金融和商贸中心,同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联系相当密切,在这些地

方设立特别行政区,保留其原有的制度和经济活动地位,就可以架通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进中国的桥梁,直接为中国提供一个商业接触、金融谈判以及搜集西方技术、商业情报的便利场所,成为走向世界开展经贸活动的跳板。一句话,为中国参加世界经济活动提供极为方便的通道。

2、经济特区思想的主要内容

(1)经济特区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综合性经济特区

邓小平在视察深圳、珠海经济特区时明确指出,特区姓“社”不姓“资”。这就表明我国的经济特区是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区,他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不是发展资本主义。因此,兴办经济特区决不是要给投资者什么政治特权,只是依法给予投资者在投资上的优惠和方便,并保证其合法的权益。同时,我国的经济特区不同于西方国家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集工、农、商、科技、旅游等于一体的综合性经济区。

(2)经济特区的指导思想是放,不是收

邓小平指出:“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8]这就是说,兴办经济特区不是要缩小对外开放的范围,而是要扩大对外开放,以良好的投资环境和优惠的政策,吸引更多的外资,引进更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使外国更好地认识和了解中国,加强中国与世界的联系。经济特区的建设坚持一个“放”字,就是要把一切束缚经济特区顺利发展的绳索通通解除,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大胆创新,开创一条对外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路。

(3)经济特区实行特殊的经济优惠政策

经济特区的“特”不在于脱离社会主义的发展轨道,而主要体现在实行不同于内地其它地区的特殊经济政策。具体讲就是:对外来投资者在税收、土地使用、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给予特殊优惠政策;经济管理有较大自主权和灵活性,经济特区就是靠这些特殊经济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推

动经济特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发展。

(4)经济特区的地位是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实验基地

邓小平曾明确指出:“特区将成为开放的基地”^[9]，“经济特区还是一个实验”。^[10]我国的经济特区是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设立的实验基地。我国现行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许多做法都是先在经济特区这块“试验田”中试行的。如价格体系市场化,基建招标投标,劳动用工合同制,住房商品化,企业股份制等等重大改革,都是首先产生于经济特区,经过试验、创新,然后将成功的经验输入内地,进而推动内地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

(5)经济特区以外向型经济为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对外开放的窗口作用

邓小平多次指出:我们特区的经济要从内向转到外向,“由内向转为外向,就是说能够变成工业基地,并能够打进国际市场”^[11]。经济特区的发展方向,必须面向世界市场,大力吸收外商来投资办厂,在有条件的经济特区应把生产过程的两头(原材料来源和销售市场)都放到国际市场上去,生产按国际市场的需要进行安排,以出口创汇为主要目的。与此同时,经济特区还要充分发挥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和对外政策的窗口的作用,积极引进、消化国外的先进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先进的科技知识和优秀的管理人才,增进世界与中国的相互了解、合作与交流。

由上可见,邓小平的特区思想是一个内容丰富,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

四、邓小平特区思想的基本特征

1、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统一

邓小平的特区思想充分体现了原则的坚定性,在设想建立特别行政区时,始终强调坚持国家统一,坚持一个中国,始终坚持大陆主体社会主义不变,决不拿原则作交易;在兴办经济特区过程中,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在坚持原则的坚定性的同时,邓小平的特区思想也体现了很大的灵活性,主要表现为允许在特别行政区内,

保留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允许在经济特区内,实行特殊的经济优惠政策,灵活的经济措施和管理体制。邓小平的特区思想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的统一,既保证了祖国实现和平统一和大陆主体的社会主义,保证了经济特区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又有利于香港、台湾、澳门的稳定和繁荣,有利于对外交流和经济建设的发展。

2、时代性和国情性的统一

当今时代以和平、发展为主题,围绕这个时代两个主旋律就是反对暴力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努力发展科技和经济,积极参加世界的科技和经济竞争。邓小平站在时代发展高度,把国际环境和国内实际结合起来考虑,从维护世界和平和社会稳定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通过在香港、台湾、澳门设立特别行政区,以和平的方式收回香港、澳门的主权,和平地实现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的伟大设想,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各国人民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的目的在于发展科技和经济,而当今时代各国科技和经济的发展都是在扩大开放、加强交流与合作中进行的。一个国家科技经济发展的快慢,是和他对外开放、交流与合作的程度成正比的。邓小平和党中央正是从这个时代特征出发,结合我国内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提出在沿海的深圳、珠海、厦门、汕头、海南岛设立经济特区,在香港、台湾、澳门设立特别行政区,以此为窗口和通道,更好地实现对外开放、对外交流与合作,进而推动全国科技和经济的发展。

3、继承性和开创性的统一

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要迅速发展生产力、改变落后面貌,必须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科技和经济成就,这是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了这一伟大思想,并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创造性的发展了这一思想,他以巨大的理论勇气,第一次创造性地提出在社会主义国家内设立特别行政区,并允许在特别行政区内保留资本主义制

度,以此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保证香港、台湾、澳门的稳定和发展,使我国能更有利更充分更直接地利用资本主义。同时,邓小平还创造性地提出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设立经济特区,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把资本和技术引进国门加以利用,以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可以说,特区思想是邓小平对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思想的开创性发展,开创了社会主义利用资本主义的新形式。

五、应当重视对邓小平特区思想的研究

邓小平的特区思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对于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加速改革开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是由于邓小平设立特别行政区思想的提出,才顺利地解决了香港、澳门的历史遗留问题,使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时间指日可待,也使海峡两岸关系日趋好转,经济文化交流不断加强。正是由于邓小平兴办经济特区思想的提出,才有了沿海经济特区的发展,才打开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吸引了许多外资和国外的先进技术,并创造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和建设经验,有力地推动了内地乃至全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邓小平的特区思想,就不可能有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实现,也没有今日中国经济的腾飞,甚至也没有中国今天的国际地位和影响。

我们今天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的特区思想,不仅对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和进一步改革开放,进行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对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对于解决国际争端问题,都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注:

[1] 《邓小平经济思想研究》。

[2][5][6][7][8][9][10][1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2,64,30,58,51,52,133,239页。

[3]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33页。

[4] 《列宁选集》第4卷,第501页。

责任编辑 吴长开

邓小平的青年观初探

孟东方

邓小平同志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总设计师,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其理论的最大特点就是坚持实事求是,密切联系实际,富有开创性,充满勃勃生机,邓小平同志关于青年和青年工作的论述甚丰,是邓小平同志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同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思想、文化思想、军事思想等一道,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谁赢得青年,谁就赢得未来,邓小平十分重视青年人,重视青年人的历史作用。早在1955年,邓小平就高瞻远瞩地指出:“我们的党十分重视青年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这一代的青年广泛地受到党的教养,受到革命的锻炼。无数的事实表明了新中国的青年是敢于向前看的,是生机勃勃的,是对社会主义抱有无限热情的,是有强烈的上进心的。我们毫不怀疑青年是我们的希望和我们的将来。”^[1]进而1956年在党的八次代表会议上,邓小平更精辟地指出:“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我们一切事业的继承者。”^[2]1978年邓小平强调说:“科学的未来在于青年。青年一代的成长,正是我们事业必定要兴旺发达的希望所在。”^[3]

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南巡重要讲话时,在三强调要重视青年人的作用,寄希望于青年人,在视察深圳市先科激光电视有限总公司,参观激光视盘生产车间,看到大多数都是25至30岁左右的由全国各地找招聘来的科技人员时,很高兴地说“很好,高科技项目要让年轻人干,希望在青年人身上。”^[4]邓小平为什么一直如此重视青年和青年的作用呢?1958年,邓

小平在一次对农村青年生产队问题的指示中认为“我们的党不管解决大问题也好,中问题也好,小问题也好,都要依靠一种力量。”工作就是要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就必须依靠一种力量。无论在过去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今天的建设时期无一例外,解决问题,要靠党的力量,靠工人的力量,靠农民的力量,靠解放军的力量,靠知识分子的力量等等,在他们之中谁的力量又是最积极的力量呢,邓小平认为“青年人天不怕地不怕,这是一个很好的力量,积极的力量。”“青年是社会一支积极力量,集中青年力量,去起突击队作用,去克服困难,去示范作用和先锋作用,肯定是必要的。”^[5]我们在各条战线上的一切工作,都要重视和注意青年的积极的力量,正确领导和发挥青年的力量。

中国青年是党和中华民族所信得过的一支积极向上的力量,他们没有辜负党和中华民族的重托,没有辜负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殷切希望。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到掀起抗日怒潮的“一二·九”运动,再到反内战、反饥饿、反压迫的“五·二〇”运动等充满艰辛的岁月里,以及今天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滔滔洪流中,中国青年立下了汗马功劳,邓小平客观地评价说是“一个好的力量,积极的力量。”正因为如此,邓小平特别反复强调党要重视对青年一代的争夺,他认为是否赢得青年人,是关系到我们党的未来、前途和后继有人的重大问题,他特别重视如何赢得青年人,他认为对青年的工作要放在“争夺下一代的斗争”中去考察,把争夺青年人提到了关系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战略

高度。因而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的战略和我们的反和平演变的斗争长期存在,斗争的焦点就是对下一代的争夺。“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6]所以,“要把青年教育好”培养好接班人,正是基于这个基本观点,邓小平从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加强经济建设,要教育好青年,要关心青年、信任青年、选拔好青年干部,从制度的保证和经济上的发展给青年带来实际的利益;政治上对青年充分信任,为青年成长提供好的社会环境,同时加强对青年的教育,提高青年的思想觉悟,从青年的主体方面使青年的思想同党的指导思想保持一致,领导青年跟党走,当社会环境同青年素质紧密结合在一起,就能使我们党赢得青年,从而赢得未来。

所以青年既是“未来”,又是“现在”。现代这一代青年,是我们经济建设中的一支最活跃的力量。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代的力量发挥。新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改革和开放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青年的觉悟和奋斗,因而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就要象邓小平那样重视青年和青年的作用,从而使广大青年为我们的伟大事业不断开拓新的领域、作出新的贡献、增添新的光彩。

二 要充分发挥青年的积极作用,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就要加强对青年的教育。邓小平早在1957年就指出要“用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青年一代。”^[7]在1964年郑重指出:“关键性的问题、严重的问题,是教育青年一代。”^[8]1979年又语重心长地说“我们一定要教育好我们的后一代。”^[9]

邓小平在1957年就说过:“有人说,过去对青年的思想觉悟估计高了,我看,这句话是对的。任何时候都要估计足,但不要估计过高。如估计得不适当,说青年的共产主义觉悟已经很高了,那么要作什么工作呢?我看,这点是值得注意的。如果说去年下半年我们的工作有缺点,恐怕这是一个原因,因为这样就不谨慎了,就不进行教育了。”^[10]邓小平认为对青年的思

想觉悟,一方面要估计足,另一方面又不要估计太高,这是两点论,估计足就是从整体全局来认识青年的积极创造力量,对他们充分信任,并发挥他们特有的优势,但不能估计过高,对青年放任、迁就、迎合,不进行教育,不严格要求是不对的,那就会犯大错误,对青年自己不利,对国家、社会和民族不利。

在过去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建立中,中国青年不怕牺牲,不怕困难,不怕吃苦,热爱劳动,遵守纪律,有良好的表现,但是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应该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的顺利环境中生长起来的一代,是朝气蓬勃的,但是也有弱点。这就是他们中间不少人往往把事情看得很容易,往往害怕困难,不愿吃苦耐劳,或者在改善物质条件方面提出过过激的要求。”^[11]所以必须加强对青年人的教育,当前,在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邓小平说得严重的问题是教育青年一代,更具有其深刻的现实意义。

邓小平首先认为“教育就是要讲共产主义教育。……在青年中要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永远要说这一条。思想、品德、集体主义都是共产主义教育。”^[12]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对全体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作为己任,共青团的建立更是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学校。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是中国共产党人以及广大先进青年终身奋斗的目标,也是人类最终的理想,因此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就其实质内容而言,最主要的是进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邓小平说:“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列主义的信念,有共产主义的信念。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我希望宣传方面任何时候都不要忽视。”^[13]理想是人生奋斗的目标,是人生的大道理,人生大道理明确了,小道理就迎刃而解了,所以我们从事青年工作的同志要牢牢

记住这一点,任何时候不能忽视对青年的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共产主义是长期的,但也是具体的,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就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理想的共产主义是靠眼下一点一滴的努力而积累起来的,因此更是非常具体的事,也就是说共产主义教育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实实在在的,渗透在每一个教育环节之中。那么,在现阶段,青年人怎样做才算立远大理想呢?邓小平1992年8月在给青年大学生的信中说:“同学们是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也是跨世纪的一代,实现我国第二、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光荣使命将落在你们肩上。”青年树立远大理想,就是要把个人前途同祖国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脚踏实地、刻苦学习、掌握过硬的本领,把自己培养成为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需要的合格人才,担负起振兴中华的重任。

其次,邓小平认为在对青年进行理想教育的同时,还要加强纪律教育。邓小平把对青年的纪律教育放到了和理想教育同等重要的地位。严明的纪律是我们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保证。他强调“有了理想,还要有纪律才能实现。纪律和自由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两者是不可分的,缺一不可。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没有理想、没有纪律,就会象旧中国那样一盘散沙,那我们的建设怎么能够成功?……所以,有理想有纪律,这两件事我们务必时刻牢记在心。”^[14]邓小平再三强调要对广大青年进行纪律教育,这是因为我国是个大国,靠什么才能团结,组织起来呢?除共同的理想外,还必须有纪律的保证。在革命年代如此,今天搞建设更是如此。今天“中国的主要目标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人民生活逐步得到改善。要做这样的事,必须有安定的政治环境。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在强调发展民主的同时,要教育我们的人民特别是青年要有理想,守纪律。”^[15]而只有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讲纪律,中国才能有个稳定的环

境。邓小平对青年强调纪律,还因为青年正处在成长阶段。民主和集中的统一,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自由和纪律的统一。青年对民主容易接受,但对纪律却不是那么喜欢。向青年着重讲纪律问题,使广大青年明确个人自由的充分实现同遵守必要纪律是完全一致的。没有一定的秩序,一定的纪律,任何个人的自由都得不到的。因此,讲纪律有利于青年的顺利成长。

再次,邓小平认为在加强对青年进行理想纪律教育的同时,根据社会现实情况,还应该加强对青年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教育。针对目前青年的思想情况,“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16]“中央认为今天还是有很大的必要强调宣传这四项原则。”^[17]同时要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从根本上进行教育,在进行有针对性地加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的同时,邓小平也特别强调爱国主义、共产主义人生观和社会主义道德观的教育和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因此,必须发挥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邓小平认为:“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属于精神文明范畴。”^[18]“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否则,我们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就会被种种资本主义势力所侵蚀腐化。”^[19]当前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我们党内和社会上还存在不少不正之风。有的人民族自卑感严重,盲目崇洋媚外,忘自菲薄,认为西方社会的一切都好,“祖国贫穷落后,没有什么可爱”;有的人在对外事务中做出有损国格、人格的事;有的人为了个人的私利,进行贪污受贿,非法致富等等,这些人把爱国主义精神,把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抛得一千二净,对此邓小平指出:“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耻辱。”^[20]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

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21]同时,邓小平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提倡和表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服从组织”、“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因此“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这四条里面,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22]邓小平反复强调:“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的确经过十多年的实践证明“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23]那么“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就是要从具体事件抓起。”要“真正抓紧大有希望,不抓紧就没有希望。”^[24]

三 青年是社会生活中的一支积极的力量。一项事业青年人参与多少,是该项事业是否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之一。但在实际生活中,并不是每一个人,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能自觉地认识到并认真贯彻执行这一论点。有的领导总是怕这怕那,怕青年人“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对待青年人不是等等再说,就是不屑一顾,从而使大批有才智的青年人得不到重用而被埋没。贻误了工作,损害了革命的事业。

邓小平是实干家,最反对讲空洞,反对叶公好龙,他的这种马克思主义求实精神体现在青年和青年工作中,他认为教育、培养青年,是为了使用青年,使青年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各方面的合格人才;批评青年中的错误倾向,也是为了爱护、帮助青年,而不是把他们看成一团糟。邓小平对当代青年的现状作了正确的评价,对他们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对他们的未来表示了极大的信心。制定了大力选拔、使用青年人才战略方针。

他早在1961年就讲:“这几年来,我们对技术干部关心不够,对他们的使用有问题。有许多新生力量、能力未能得到很好地发挥。好多大学毕业生,工作几年还当见习技术员,为什么不能大胆提拔当工程师?……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把年轻人提起来,放在重要的岗位,管的业务宽了,见识就广了,就能更好地发挥作用。要重视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年轻人。世界上的科学家,成名的很多是在三十岁左右,现在不重视培养提拔年轻人就晚了。”^[25]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是一句老话,但邓小平在这里讲的却有新的意义。人的才干只有在使用的过程中才能施展出来,不给一定的位置,怎么能知道行还是不行呢?给青年以一定的位置,大胆使用,是邓小平对青年特别是青年工作的一贯思想,他每一次关于青年和青年工作的讲话,以及决策有关党和国家一些重大人事问题,无一不闪烁着这一光辉思想。

大胆起用年轻优秀人才是保证祖国千秋大业的战略决策。首先大胆起用年轻优秀人才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善于发现、提拔以至大胆破格提拔中青年优秀干部,这是国家现代化事业的客观存在的迫切需要,并不是一些老同志心血来潮提出来的问题。”^[26]同时“选拔培养中青年干部这个问题太大了……这是个战略问题,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现在,解决这个问题已经是十分迫切了。再过三五年,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要来一次灾难。”^[27]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重要讲话又从反对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的战略高度,强调了按“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标准来选人进班子的重要性;其次邓小平看到了现行组织、人事制度不利于促进年轻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的问题,认为大胆起用年轻优秀人才是组织、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现行的组织制度和为数不少的干部的思想方法,不利于选拔和使用四个现代化所急需的人才。希望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在这个问题上来个转变,坚持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

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坚持同一切压制和摧残人才的现象作斗争”;^[28]再次邓小平认为老干部的第一位任务就是选拔好中青年干部,这是老干部对党的最后一次历史性的贡献,我们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国家的政策、党的方针,我们当然要过问一下,但是最大的事情是选拔中青年干部。”^[29]邓小平认为为了使青年人在其位,谋其政,因此“老同志要让路”,他还形象地说“庙只有那么大,菩萨只能要那么多,老的不退出来,新的进不去,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因此,老同志要有意识的退让。”^[30]

大胆起用年轻优秀人才,必须破除论资排辈的观念。首先邓小平认为论资排辈是一种顽固的而阻碍年轻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旧思想。“现在我们工作中真正的骨干大都是四十岁的人,三十岁左右的骨干还很少……是因为被我们这些人盖住了,是论资排辈的习惯势力使得这些年轻人起不来。”^[31]同时“我们说资本主义不好,但它在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方面是非常大胆的。它有个特点,不论资排辈,凡是合格的人就使用。并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论资排辈是一种习惯势力,是一种落后的习惯势力”;^[32]其次,邓小平认为要敢于破除论资排辈的旧观念,唯贤是举,“不要看不起年轻人,总觉得年轻人不如我们行。其实,我们过去干工作多大岁数?还不是二十几岁就做大工作了。现在的人就比我们蠢一些呀?我看还是开明一点,要从大局着眼,要从我们事业的前途着眼。有能干的人,我们要积极地去发现,发现了就要认真帮。”^[33]

大胆起用年轻的优秀人才,必须破除求全责备的思想,树立能上能下的干部机制。邓小平多次强调起用年轻优秀人才可以看一看,不要求全责备,不要怕选不准,“一定要趁我们在的时候挑选好接班人,把那些表现好的同志用起来,培养几年,亲自看他们成长起来。选不准的,可以换嘛。”^[34]在选拔青年干部的工作中,往往出现这样的问题,一个年轻人被选中了,四面八方就来评头论足。这些议论,有的是把

优点看成缺点,有的是把缺点夸大,有的是把缺点看成不可改变的。邓小平针对某些对青年干部的议论说:“一般都觉得这样的人太嫩了,或者还有一个说法叫‘骄傲’。‘骄傲’两个字我有点怀疑,凡是有干劲的、有点能力的,他总是相信自己,是有点主见的人。越是有主见的人,越有自信。这个并不坏。真是有点骄傲,如果放在适当岗位,他自己就会谦虚起来的,不然他就混不下去。”^[35]这种对待青年干部的态度是何等的开明,这种开明的态度,不仅在选拔干部问题上,而且在一般青年工作中都是很有必要的。进而邓小平认为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逐步制定和完善以能上和能下为主的干部制度,他认为要抓住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个中心环节,并结合实际加以具体化。在坚持干部四化的标准上,邓小平还特别重视从干部制度上解决问题:“我们要改革现行的干部工作制度,建立有利于提拔年轻干部的制度。”^[36]

综上所述,邓小平的青年观的出发点是寄希望以青年,要使青年健康成长必须教育好青年,进而要大胆使用优秀青年,充分发挥青年的“积极力量”。

注:

[1] 《邓小平论社会主义时期青年和青年工作》第1页。

[2][7][11][25]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43、264、266、277页。

[3][9][16][17][19][20][21][26][27][28][29][30][31][32][33][34][35][36]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92、163、150、151—152、328、372、326、283、339、286、343、178、195、197、229、177、342、244页。

[4] 《一九九二年春邓小平与深圳》第25页。

[5] 参见《青年学刊》1992年第4期第11页。

[6][13][14][15][18][22][23][24]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0、110、111—112、244、28、110、144、152页。

[8] 邓小平1964年接见外国代表团时的谈话。

[10] 邓小平1957年2月18日接见青年团省、市委书记时的谈话。

[12] 邓小平在听取团中央汇报工作时的指示,1961年10月17日。

四川少数民族的构成、人口分布特征及形成原因

罗正富 李文碧

四川是一个多民族的省,除了汉族之外,还居住着众多的少数民族。本文根据1990年《四川省第四次人口普查手工汇总资料》,就四川少数民族的构成特点及其人口分布特征作一粗略分析。

一、四川少数民族的构成特点

1、少数民族类别多人口少

据1990年四川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四川省共有52个少数民族(不包括未识别民族和外国人加入中国籍的民族),占全国55个少数民族类别的94.5%。按人口多少排列,依次为彝族、藏族、土家族、苗族、羌族、回族、蒙古族、傣族、满族、纳西族、白族、布依族、傣族、壮族、侗族、哈尼族、佤族、仫佬族、朝鲜族、拉祜族、水族、瑶族、土族、黎族、锡伯族、维吾尔族、布郎族、高山族、普米族、佤族、苗族、基诺族、怒族、哈萨克族、京族、达斡尔族、撒拉族、独龙族、东乡族、景颇族、阿昌族、俄罗斯族、赫哲族、毛南族、门巴族、柯尔克孜族、塔巴族、鄂温克族、塔塔尔族、德昂族、乌孜别克族、鄂伦春族等。与1982年人口普查相比,增加了塔巴、塔塔尔、乌孜别克、德昂、鄂伦春等5个民族;减少了塔吉克和保安两个民族。

四川52个少数民族的总人口只有4886974人,仅为全省总人口107218173人的4.56%。其中占全省总人口1%以上的只有彝、藏、土家3个民族,他们分别为1.66%、1.01%、1.00%;其余49个少数民族总人口不到全省总人口的1%,仅为0.89%。

2、世居少数民族类别少人口多,非世居少数民族类别多人口少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已形成并具有一定聚居区域的少数民族,称为世居少数民族。四川世居的少数民族有14个,他们是:彝、藏、土家、苗、羌、回、蒙古、傣族、纳西、满、布依、白、壮、傣等。其总人口为4877228人,占全省少数民族总人口的99.80%。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已形成但并没有一定聚居区域的少数民族,称为非世居少数民族。四川非世居少数民族有38个,总共不到1万人,仅有9746人,只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0.20%。

除此之外,尚有未识别的民族1012人,外国人加入中国籍的44人。

3、以彝族、藏族、土家族为主,次为苗族、羌族、回族。

四川52个少数民族中以彝族、藏族、土家族为主,人口均超过100万,其总人口为3947566人,占全省少数民族总人口的80.78%;其次是苗族、羌族和回族,其人口均超过10万,共有人口840756人,占全省少数民族总人口的17.20%。以上6个少数民族的总人口为4788322人,占全省少数民族总人口的97.98%。其余46个少数民族人口不足10万人,只有98652人,仅占全省少数民族总人口的2.02%,其中蒙古族、傣族、满族,其人口超过1万,共有人口55497人,占全省少数民族总人口的1.14%;纳西族、白族、布依族、傣族、壮族、侗族、哈尼族等,其人口均超过千人,共有人口39188人,占全省少数民族总人口的0.76%^[1];千人以下百人以上的少数民族有16个,共有人口5455人,占全省少数民族总